

## 文学冀军·实力矩阵——刘荣书小说创作评论

刘荣书是与“河北四侠”同期出现在河北文坛的优秀实力派小说家之一，1968年生于唐山市滦南县，1997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经过多年辛勤耕耘，刘荣书在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中短篇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党小组》，中篇小说集《追赶养蜂人》《冰宫殿》，多篇作品被选载并收入年选，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长篇小说入选2017年中国好书书目，获剑门关文学奖、孙犁文学奖等奖项。

刘荣书的小说创作，既秉承河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又在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表现个人经验的过程中，谋求新的写作变化，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风格。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与河北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刘荣书小说创作研讨会，对刘荣书小说创作进行总结和评判，也是对河北文学经验的一次深入发掘。

## 灰暗但不绝望，生活有梦就有光

何弘：刘荣书的创作有三个特点：对人性的揭示，对当下现实的关注，以及人物内心状态的描写。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增强了生活的内在逻辑性，呈现出每一个人物内在的精神生活。小说《盛宴》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体现出人物差异性，包括《难以启齿的身世》《一百零一夜》等作品中，没有对人物的好恶做简单判断。刘荣书的写作依赖于现实，却又对现实有所超越。故事是文学最朴素的载体。刘荣书对故事有自觉的要求，故事有反转，依靠情节的推进，搭建叙事框架，体现在人物身上，表达的则是一种理解和悲悯的情怀。

陈定家：刘荣书的小说在人性深度的挖掘，以及文学精神的坚守这两方面，都值得称道。他所写的个人记忆、生活经验，都会给人带来一种真实的感受。读刘荣书小说的时候，能从他小说里的很多人物身上，找到我家乡人的影子。这就让我感觉特别亲切，感受也很深刻。小说的人物设定也很精彩，故事结构有寓意。

## 回旋、迭起之间的希望与情意

陈东捷：刘荣书的写作辨识度很强，个性化叙事风格明显，依据地域符号化的描述，并非直接、简单地对日常生活的摹写，而是能够从日常生活中跳出来，比如《珠玉记》。人物和场景的选取很有特点，比如《雾夜坦途》。身处困境中的普通人并非屈服于生活，而是对生活抱有梦想。《扯票》中的小女孩，便是这种梦想的体现。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是遵循精神的走向而设定的。刘荣书的小说多写现实的困局，但最终会倾向于温暖的、有亮光的结局，也不是那种皆大欢喜的戏剧性。作者这几年的创作量比较大，一直写下去会不会形成固定模式？今后可以朝着人的精神

## 创作就要在生活中“扑腾”

## ——专家研讨刘荣书小说创作



神困局方面开掘，或者尝试写一下悲剧。

张莉：刘荣书的语言有质感。一看就知经过很多年写作的训练，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叙事风格和语言魅力。他的小说有一种日常性和切肤感，像小说《雾夜坦途》的开头，一段不是很戏剧化的描述，味道就完全出来了。作者往往会为他笔下的人物找一个温柔之地，对生活表达出一些希望和爱意。这样的作品写起来会有难度，也会形成作者个人风格上的挑战。但故事一旦形成一种模式，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好小说不能只是一种价值观的呈现，对待写作的对象要恰如其分，过于善待和过于苛责，都不是艺术最好的尺度。刘荣书小说里面的调性有契诃夫小说的影子。但契诃夫的小说往往会在小说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处，有一个情节上的陡峭——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看。这个陡峭是小说最好的东西。

张菁：刘荣书很懂得小说的故事设计，所以他的小说总是有起伏、回旋和迭起的高潮。尤其可贵的是他对细节的讲述，语言比较节制，小说推进和意蕴因此有了更多的层次和力量。从作品中，能够看出作者一直往前走的那种突破性意识。刘荣书的小说有两个关键词。第一是困境，他的小说始终在呈现困境，并试图突破困境。第二个是相信对未来的期待，对情意的坚持，对人性善好的呵护。当下的写作，应当在“我们有什么和我们有什么”“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可以是是什么”之间划分标线。更为重要的则是

搭建桥梁，让我们得以看到一条向好、向善和向美的通道。刘荣书在做，也基本做到了。除了在推进故事以及叙事节奏感等方面可再做调整外，作者还可以在关注生活困境的同时，提高对人的精神困境的关注。我们体恤和共情他者，是在努力达到更高的精神层面生发的。如果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结合得更好，小说会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 从先锋实验到内敛、纵深的笔触

郭艳：我对刘荣书前期的作品比较熟悉，看到他近期的作品时比较惊讶，发现他近几年创作有比较大的变化。他前期作品多从少年的生命体验出发，呈现乡村伦理秩序中的灰暗与冷漠，以写实主义为表现形式，叙述当下乡村中国，是一种极端化叙事的倾向。这一批作品则内敛了许多，是一种从个体的痛感出发，面对人生困局中的中年心态的写作。小说《扯票》，原本非常流畅的少年叙事，尽管还是以小女孩的视角为出发点，叙事角度却发生了很大转变，出现了更加纵深的视角。从人物内心的生命体验，转换为对外部的清晰感知。小说《盛宴》，则是极端化的伦理情感纠葛，转换为更为冷静、平和的一种呈现状态，这喻示着作家的写作有了一个很好的转变。《难以启齿的身世》这篇小说，能够看出作者试图从大历史的角度深入情境描写。从建构的角度来看，小说文本是有价值的，反映了这一代作家直面历史本身的态度。这类题材在如何深入叙述人物命运，从更本质的生命体验出发，进行叙事等方面，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张颖雯：刘荣书早期的小说中都会有一个类似疯癫性质的人物，作品有诗性的意蕴。往往讲述一个很惨烈的故事，最后会为笔下人物寻一条出路。有传奇性，峰回路转之间能找到故事的平衡。为看似无解的生活，寻求一条出路。我觉得对读者或纯文学写作来说，这方面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路径。他近期的作品能看出写作方向上的调整，有很明显的变化。他最近的一篇新作写有关婚姻、爱情和命运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他所有小说中最有中国传统意蕴的一篇小说。小说所呈现的道德伦理之间的碰撞，处理起来很陌生复杂。这篇小说在观念和包容性上，有更宽广的心态。他原来的小说有很多先锋和实验元素，现在笔力越发平实，呈现出来的东西，反而更复杂。

记得2013年春天的某个早晨，我曾对自己说：既然做生意这扇门关闭，怎么也走不通。那就坐下来，好好琢磨一下小说吧……作为一个年逾不惑的中年人，那段时间，好像遇到人生中的一道道坎儿，做什么事都不太顺利。但小说发表这件事，却莫名其妙地顺畅了一些。那年春天我做出的这个近似荒唐的决定，并非从容的选择。而是无奈之下，一种莽撞的投机行为。

就这样，从2013年到现在，我都在专心写着小说这件事。

在我看来，由兴趣出发，不抱任何功利目的的写作，才是名目繁多的写作方式中最幸福的一种。大体上，也基本符合人类的生理需求——像我这样仓促上阵的写作，说起来未免有点寒酸：考虑如何将小说写好的同时，还要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始终将自己设定在一个“写”的状态。稍有怠慢，便会觉得空虚。更像一个需靠劳作维持生存的人，一旦没来由地停止了工作，便会有一种犯罪感。除此外，他确实需要不间断的写作，才可将肉身在这世俗中妥善安放，才能在生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那段时间，我试图将自己训练成一名拥有写作技能的人。就像身边众多的匠人，凭手艺吃饭，过朴素的生活。我坐在一间斗室里，进行着烹文煮字的勾当。借由肤浅的感受、不切实际的幻想，编造着一个个略显生硬的故事。文字有形，有时又无形。它们像一粒粒呼啸的子弹；又像一片片灰烬，当空落下，将枯坐桌边的人慢慢掩埋……语言让人迷失，叙述使人沦陷，人也仿佛一下脱离了日常的轨道。即便如此，又有多大斩获呢？直到现在，我也只掌握了一点写作的皮毛。如今再看写下的那些人物，个个面相模糊，从中很难找到一张熟悉的的面孔，哪怕一个印象至深的表情……这是我缺少悟性所致。这也说明，几年下来的努力，只不过是又一次次练笔而已。

这倒也无妨，我该认命。毕竟学好任何一门手艺，都需经历一段艰苦的过程。况且写作充满变数，今天悟出的一点道理，不待明天便会被自己“枪决”。实践中慢慢找到的一些套路，在别人眼里竟是如此拙劣。写作的日子里，总会在自我怀疑中度过。一篇小说结束，另一篇小说开始之际，那种对叙述腔调的寻找和把握，更是会使人陷入焦虑。有人说写作要抱有野心。我的理解是，健康的写作，终究是一件淡泊之事。所谓“野心”，应是朝着他设定的目标踏步而行时，不要出现任何妥协和气馁的表现。能保持一份写作的初心，即保持对写作的热情，才是最为重要的。

回顾2013年以来的写作，我更像处在一条逼仄的、类似机械的流水线上，制造着一件件平庸的产品。而未能将一块块璞玉，打造成接近于艺术品的那类玩意。更令人感到焦虑的是，当所谓个人经验抒发殆尽，又如何将写作持续下去？况且，作为平庸的个体，也不会有更多鲜明的、能够示人的感受。唯一的出路无非是：去写他人的故事。去写更广阔空间里无数他人的命运，或是去历史的罅隙里寻找灵感。这也面临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生活如浩瀚之海，如何从中舀到货真价实的勺，才能熬制出你所需的营养？基于这样的困惑，我更想成为一名技艺加身的工匠，面对任何一块陌生的材料，都能找到使它成型的办法。

想起一出名为《张羽煮海》的戏剧：秀才恋爱不得志，得蓬莱仙姑所赠三件宝物：铁勺、银锅、金钱。沙门岛煮海，将龙王降服……写小说好像也似这样，用文字铸成器皿，将生活投放其间，点火烹煮。只是写作这种行为，终究不会降服什么。

烹文煮字的人，只能将一勺勺海水徒劳地填入釜中，见一缕蒸汽，不得一粒盐的结晶，又会让人想起那位被困在哲学山谷中的西西弗斯，经年累月地推动着那块沉重的石头。

## 煮海

刘荣书



徐刚

## 小说如何胜过新闻

——谈谈刘荣书的创作

刘荣书近期的中短篇作品有着一个极为醒目的特征：几乎都是按照或明或暗的新闻事件线索组织起来的。不是根据新闻素材直接改编，就是从新闻故事中获取灵感加工而来。如此看来，新闻在其作者个人的写作脉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以至于借助刘荣书的小说，我们得以有机会更好地思索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即所谓小说与新闻的竞争关系。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作家的创作总离不开对于外部信息的摄取。甚至一般会认为，作家成熟的标志往往就体现在他不再孜孜以求地书写自我，而是从狭小的个人世界蔓延开去，辐射更多的人与事。这在刘荣书这里也体现得极为明显。从自我到世界的过程之中，某种外部事件，比如新闻的灵感，便常常构成写作的重要参考。

面对一个新闻空前繁荣的年代，加之自媒体的高度发达，“匪夷所思”的“新闻”已然层出不穷。对于小说家来说，或许是幸事，因为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对于作家来说，这些层出不穷的事件也构成某种写作的挑战：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将小说与新闻进行比较。当然，更多的写作者不得不承受被海量新闻信息淹没的命运。“个人化”被压缩到狭窄的生活空间之中，写作也沉迷在一种类似新闻性的表象快意之中，“道听途说”一度甚嚣尘上。因此有人追问，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何种意义上求助于新闻。是一味捕捉“表象”，“抄袭”现实，还是从现实出发，探索人性的“褶皱”，致力于文学擅长描摹的内心世界，这是小说伦理的严峻抉择。

事实上，以小说的方式，为新闻事件赋形，将其纳入艺术实践，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常见。司汤达的《红与黑》便取材于一件枪杀案的新闻；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则源于一起新闻报道的诉讼案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甚至鲁迅的《药》也是脱胎于徐锡麟行刺失败后被清兵生食心肝的真实新闻。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闻取材本身，而在于小说如何以此为契机，将写作素材完美消化，从而达到再现现实的艺术目的，由此呈现时代精神的“幽深”。

时至今日，从《熔炉》《我不是药神》等电影来看，真实事件改编的文艺作品所体现的吸引力与震撼力，依然值得创作者高度重视。因此，改写新闻故事，并不是小说家的过错，关键在于改写之后的效果如何。所幸的是，刘荣书在这一点上处理得比较出色。纵观他近期的作品，无论是《扯票》里走失的小丫头，还是《滦南姑娘》里死磕到底的杨琼芬，甚或《虚拟爱情》里恶作剧般的网上事件，以及《雾夜坦途》里带着父亲跑出租的“我”，莫不都是通过真实事件改编而来。新闻对于小说的启示作用足见一斑。

问题关键在于，小说为新闻增加了什么。这里显然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故事的流畅度，戏剧性和传奇性，即在故事本身上下足功夫，营造出故事的曲折和生动，将新闻未曾呈现的曲折离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此层面，刘荣书的小说不待言。他几乎每一篇作品都特别引人入胜，能够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朴素的阅读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中篇小说《雪人》，以侦探悬疑的故事结构展开，通过所长杨渡的人物视角切入，将真相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小说里悬疑结构的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紧张感，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再加之近期东北题材悬疑侦探剧的火爆，小说作为通俗传奇影视剧改编的巨大潜力值得重视。

另一方面则是人性本身，文学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开掘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小说的目的并不单单是呈现故事，它的最终落脚点在人身上。正缘于此，我们得以在小说《虚拟爱情》中感受到刻骨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在《一百零一夜》中体味被命运抛弃者最后的变态与疯狂。因此，我们大概能够发现刘荣书最能打动人的小说恰恰是《雾夜坦途》和《潮河春醒》之类的短篇。小说通过回忆带入一些情节简单的素朴故事，无需太多戏剧性和传奇性，情感的真挚便溢于言表。

就《雾夜坦途》的情节而言，倘若带着少年一块儿跑出租算作新闻，那么让出租车在大雾弥漫的深夜偶遇奔丧的父亲，以体现平凡人在危难时刻的人性光泽，这就是小说要处理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雾夜坦途》以新闻为起点，通过一种戏剧性情境的营造，展现了人性的曲折。这让小说由一个简单的励志新闻，上升为祈求人性良善，为众生祝福的令人心生温暖的故事。这大概就是小说要做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能够与新闻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安殿荣

细读刘荣书近两年作品，与他之前创作风格和手法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但也呈现了细微的变化，一方面是故事的年代感减弱，与当下的生活结合得更紧密；另一个变化是他则更多地探究人性恶的复杂起因，多以案件的形式来呈现罪，追溯罪的形成。

诱拐、非法拘禁以及乱伦等情节，是刘荣书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节。比如此前的《囚徒》《晚香》等，新近作品中则有《一百零一夜》《我们把地球凿穿了》《扯票》《雪人》等篇。这些作品一度给人类型小说的错觉，层层悬念增加了小说的张力和可读性，但小说的目的不在于破案，而是以犯罪的极端形式，在人性与法律的边界反复试探，以此引发人们对社会发展以及人性善恶的思考。

身份是与生俱来的烙印，是难以突破的牢笼。刘荣书很多小说的主人公都陷在这个牢笼中。典型如《一百零一夜》中的男人。男人曾经当过兵、做过业务员，因为想要更好的生活，娶了患有精神分裂的妻子，倒插门做了县领导的女婿，然而即便男人真心对待痴女，也无法真正融入她的家庭。小说设置了非法拘禁的情节，而他囚禁女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情节的设置，就使男人的复杂故事有了松散的、跳跃的讲述切口。小说的落脚点在于阐述身份的隔膜，就像他的名字“先胜”与“先狂”之间的差别，不被尊重与不被理解，使他陷入近乎疯狂的状态。《扯票》中的小丫头、父亲、继母、拾废品的夫妇等，他们都是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员，被定格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小丫头的出走和扯票（撒谎）背后，隐藏的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盼，她从故意走失到被拾废品的夫妇变相控制，作家利用这个让人揪心的过程，展现了城乡结合部的种种形色。



冯祉艾

刘荣书的大部分作品都围绕着现实烙印下的命运流离书写，呈现了底层世相的生活百态。刘荣书对于宿命枷锁的展现，首先凸显在对于人物的镜像观照中。小说《雾夜坦途》以第一人视角讲述了出租车上温情故事，前半段都在零散中不断叙述“我”和父亲在车上的经历，一直到小说中段，借用了父亲的一个20多岁年轻人的出现，将他的生活故事与“我”和父亲的生活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在生死边界展示了底层生活状态下的宿命回归。小说隐秘地将“我”和男孩都投放在了相似的痛苦之下，展露原地挣扎的艰难漩涡。小说不止一次展示了出租车司机的无奈，他不断地试图同命运斗争，但苦难之下，他只能保持着微渺的妥协。小说并未着力于刻画苦难，而是利用这种同命运下的互相扶持，竭力凸显了人心在命运枷锁下的缠斗。小说最后，孩子在雾夜中远去，奔向他的不可知的命运，而“我”同样按部就班地活着，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看似一切回到了原点，但实际上，在雾夜之后的他们却都从彼此身上汲取到了更为深厚且广阔的力量。

小说《一百零一夜》有意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全程以男人和女人来指代人物，在主线故事之外，不断掺杂男人的生活经历。在故事最后，碎片式的传说

## 类型化因素与纯文学写作

## ——刘荣书近期作品评述

小说结尾，小丫头和父亲像所有童话故事里宣扬的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而稳定的生活”，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善意谎言，让人得到暂时的安慰。善愿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人物在善愿之间的游移，体现的正是生活最为残酷的部分，也是作品张力所在。还有《虚拟爱情》中的“我”，一边深怀疚疚之情，一边忍不住继续行骗，也是可恨的可怜人。刘荣书对这类人给予了莫大的关注和同情。他的作品中还写了很多身不由己的无奈。比如《盛宴》中的颜丁艳幼年差点被送入，少年遭到老师性侵犯却不取吭声等经历，使她出现在小说中时，是个不招人待见的少妇，她甚至想用假农药来吓唬家人。但当她感受到婆家的温暖，重燃生活热望后，却将倒人酸奶的农药遗忘在床头，被醉酒晚归的丈夫喝掉了。这多少有点欧·亨利小说的意味，一个阴差阳错，将悲剧放大了。《滦南姑娘》中，三妹杨琼芬偏执地认为姐姐是姐夫所杀。在法医将关键证据丢失的情况下，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以身试药。三妹的执著坚定让人感叹，而小说结尾，儿子果冻对父母亲呢行为的回忆，更让人心酸与感叹，见到了另一种真相。作家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显然不在于破案，而是剖析了不同人的立场与选择，除了生活的无奈，结尾果冻的回忆是最为动人的隐秘故事。

如果说上述小说呈现的是比较单一的“犯罪现场”，借此剖析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雪人》则借用了更多的类型化因素，人物关系也更为复杂。刘荣书以警察杨渡的任职写起，他在帮企业家曹云定调查女经理李小雪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曹的秘密，并侦破到底。这个案件卷进了冒充“国安局”身份的赌徒及骗子范道，将一个网络诈骗的故事写得有声有色，还用简单

的笔墨写到一个只身寻找失踪女儿的母亲，虽然只是在作家的“镜头”前匆匆闪过几次，这短暂的出现也为小说的调子增添了一抹寒冬的凛冽气息。杨渡的上司林局长和他同事周道义的形象，也都具有典型性，颇让人玩味。小说采取多线条的编织方法，着重表现了金钱与权力对人的诱惑和改变，以及普通人的生之艰辛等等，但其中最惹人思索的还是曹云定对他初恋的女儿李小雪的控制与折磨，并追溯到曹云定在上一个时代中所受过的伤害。这是作家藏在层层悬疑故事下的苦闷内核。

可见，将类型化小说的因素引入纯文学的创作，正是刘荣书近两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对犯罪现场的讲述，并没有遮盖刘荣书小说中温暖良善的一面，他愿意给予人物最大的宽容和谅解，他也愿意给这些卑微的人物以温暖和希望。《雾夜坦途》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体现着作家的写作才华。一边是带着患病父亲跑出租的中年司机，一边是隐忍着巨大悲恸雾夜奔丧的懵懂少年，他们在看不到前路的浓雾中的邂逅，他们互为救兵，相互取暖，互相鼓励，一起面对并走出人生的这场困境。

人生中难免都会弥漫这样一场大雾。罪的起因千种万种，而善的出发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却最为动人。对刘荣书作品的整体阅读，不难感受到他对好看小说的品质追求，他十分关注人物的境遇和命运走向，挖掘每个人物最真实的生命律动。除了对罪的溯源，期待他今后的作品，能够更加多样，注入更多如《雾夜坦途》所传递的温暖力量，以使人有勇气去冲破人生每一场大雾的围堵。

## 浓缩的原点：刘荣书小说中的“命运书写”

与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状况巧妙互文，又同时在结尾处戛然而止，加深了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慌感。女人的命运是悲惨的，丈夫瘫痪，自己被拐卖，好不容易逃脱之后，却被拖入地窖之中囚禁。更可怕的是，囚禁她的人是个疯子，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清楚。小说以女人的命运开头，最后以女人的被解救结尾，但着重讲述的命运枷锁仍然是男人。男人的生活是悲惨的，从成为上门女婿时身份的错位，到妻子的走失，最后成为一个“拐卖者”。小说将这种宿命感借用了极为隐秘的人性心理距离加以显现。一开始，女人的防备是理所应当的，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也跟着女人的情绪跌宕起伏，对男人从信任到怀疑再到恐惧，而到故事中段，女人似乎又回到她命运的原点。同样的状态在男人身上也有所展露：“他痴痴地望着她，知道那不可能是他的妻子。但后来越多像啊！应该他妻子年轻时的样子，做姑娘时的样子，花骨朵一样少女时候的样子。”小说借用了这些魔幻而又真实的人性书写，试图展露宿命枷锁下的心灵困顿，对于男人而言，走失的妻子和永远无法东山再起的人生是一场又一场死循环。

在小说《盛宴》中，刘荣书捕捉了一种笨拙而悲悯的命运苦难。从传统视角来看，颜丁艳这一形象是放荡

的，她随意嫁给了现任丈夫，同时又贪恋着网恋的快感，甚至偷钱给男人私奔。然而，这个“坏女人”也有着凄苦的经历，幼时被老师骚扰，又被自己的父母嫌弃，她在“一时昏头”之后，希望与丈夫吴复生离婚，但却不能如愿。甚至在被邻居出言侮辱并暴露了“裸聊”这一事实后，她曾经厌恶的婆婆还提出为他们买房买车，就在一切看似向好发展的时候，那一杯原本被拿来用做威胁的农药成了丈夫的催命符。吴复生喝下那杯药时，小说又发生了两次反转。或许对于颜丁艳来说，这些都是命定的苦难。

刘荣书擅长在他的作品中捕捉这些命运的魔咒，通过映射不断地寻找生活的真实慰藉。此外，他常常借用多种手法烘托宿命感，但是，无论是狭小空间下的人物角色异化，还是在时间迁延中的灵魂个体奔逃，实际上显现的都是一种对日常生活困惑之下的真实聆听。刘荣书在小说中探讨命运的原点轮回问题，擅长在不同经验与不同视角之下反复推拉，试图在难以勘测的生活之下把控永恒且不可更改的命运走向，这些极其复杂的信息共同将小说情节推入不可回转的结局。在纵深的人性背后，若隐若现的宿命感显现出绝对的高压，呈现出某些独特而沉重的历史思考。